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 编

科学研究的目标：市场竞争还是认识世界
许成钢

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
黄佩华

中东欧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经验
米罗斯拉芙·贝布拉维

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罗伯特·卢卡斯

媒体对公司治理的作用
A·迪克 L·津加莱斯

媒体俘获与政府的可问责性
蒂莫西·贝斯莱 安德烈亚·普拉特

媒体改革运动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约翰·尼科尔斯

对电信法的十点建议
周汉华

融资合约：法律差异和学习的影响
斯蒂芬·卡普兰 等

商业银行治理的国际比较
胡祖六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12

Comparative Studies

We now open the first ANEP round-table discussion. The topic of the conference is:

PAPER

« Le papier peut être fabriqué spécialement
pour la propriété du client »
« Il peut supporter des éléments incrus-
tés la pâte lors de sa fabrication
métal, plastique, fil, chlorure

1971-1980 AMT

ment du papier opacifiant
suffisamment en transparence, per-
mettre de la fabrication du papier.

SUPPLIES

et d'autres supports sont possibles :
plastique, métal, verre, etc.

abroad to exchange their views on the subject with the fellows of our institution. Having read the papers prepared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papers have been promised to produce fruitful discussions and subject matter, which is undoubtedly becoming an essential need of economic policy today.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12 / 吴敬琏主编.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4.5

ISBN 7-5086-0208-0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35753号

比较 · 第十二辑

主 编: 吴敬琏

责任编辑: 肖 梦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208-0/F · 726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卷首语

今天，我们的这一辑《比较》大谈特谈理想主义，谈在无处通行的全球化的商业大潮下，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为什么应该守住思想的好奇心和创新的那一份追求。在貌似热闹和自由竞争的媒体时代，因哪些背后的交易，让这个世界的都失去了些什么，可能得到个什么样的单调、专制、浅薄的结果。谈在转轨过程中可能陷入的思路上的混淆：所有行业都要采取“竞争上岗”，所有行当都要产业化，公共服务部门很可能干出点什么，进一步扭曲有效性原则。这一切都与政府—市场紧密相连，什么是市场可以做的，什么是市场不能做的或做不好的，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怎么才能有效率，又怎么才能体现公正与公平性？用什么样的改革原则，有哪些技术和科学办法，才能体现我们的发展观真正走上一条全面、持续和健康的发展道路？

许成钢的专访是在他多次对《比较》编辑室编辑谈话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他这两年回国教学，接触和观察到一些现象，“缺乏学术兴趣是学校和研究机构里最大的麻烦”，他有感而发，“中国在这么一个转轨过程中，都是希望学到最好的东西，这时候也往往容易迷信，在学术领域，简单地把顶尖杂志和一流大学作为竞争或评价的标准可能误导中国的科学研究。”因此，他希望对有心向学的人指出来：“最深刻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是研究者对学术探讨的无止境的好奇心，而不是在竞争中取胜。实际上这是个普遍的道理：竞争并非对所有的领域都是最重要的。经济的发展需要竞争。但历史上绝大多数最伟大的科学、艺术的成就不是受竞争所驱使。相反，庸俗化地全面推行市场会误导年轻人。”他反复说明，为什么自由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而竞争特别激烈可以变成限制自由的重要机制。为什么要让理想主义必须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间生根，鼓励、培养他们的好奇心，探索的兴趣，批判的精神，树立“为了认识世界而不是为了市场价值”的价值观。

面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众说纷纭,“前沿”栏目中提供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新作《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作者开篇就肯定了宏观经济学的作用,“为了应对‘大萧条’提出的挑战,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于20世纪40年代诞生了。在那个时代,宏观经济学代表着帮助我们避免再次发生经济灾难的专门知识。从实践上看,宏观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卓有成效地避免了经济萧条”。通过考察稳定化政策的福利收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熨平经济波动,作者认为,虽然稳定化政策所带来的福利收益并不非常显著,但在一个存在市场缺失及名义刚性的经济中,根据实际冲击的性质相机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

最近一段时间,各报章杂志对事业单位改革有很多报道,但似乎大多局限于裁员或减负等方向上。为此,我们挑选了三篇文章来讨论。我们特别请参与“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课题的世界银行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黄佩华教授做了专题演讲,期望在考虑中国事业单位改革问题时用一個更宽泛的视角和总体的框架,论述公共服务部门与政府治理的关系与角色。对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有深入研究的黄佩华教授把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归纳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和公共物品的提供。二是事业单位改革必须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有效性,较好地反映公众的需求和愿望。三是促进公共服务部门的发展与竞争性。她做了一个事业单位改革的五层决策树,清晰地给出了政府和公共服务所应有的位置、选择及原则框架。

第二篇是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治理学院执行主任,主管经济事务副总理的外部顾问米罗斯拉芙·贝布拉维的文章,比较和借鉴转轨国家的经验无疑对我们的改革是更有意义的。她的文章所描述的事业单位的情景:“一个极端无序并可以为所欲为的公共部门,这些单位和组织通常有法律赋予的自治权、权利和责任,其员工,特别是管理者享有非正式的所有权;在大多数员工心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概念模糊不清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概念差别。”从中东欧国家的经验来看,始终热衷于所谓的机构解决方案,混淆了机构改革与体制改革。导致了未曾预想到的结果、错误的激励,甚至是负面后果,而且很少有实质性的制度创新,更没有建立起新的制度框架。她指出,“怎么建立起真正的可问责机制,才是改革要注意的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反思转轨国家是否值得在机构改革上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却收效甚微,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心思用于公共部门制度框架的综合改革,特别是文官体制的改革呢?!”

斯坦顿教授的《中国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能从美国学到些什么？》是提供给会议的背景论文。美国的经验对中国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有用吗？文章提供了美国各级政府形成的历史和法律上的一些基础性资料。在美国，联邦政府虽然还为许多的公共服务拨款，但是，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是通过第三方——比如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而非联邦政府机构。如果中国政府试图将公共服务的提供移交给地方政府或者承包出去，在美国所运用的一些政府的工具，特别是政府拨款或凭证券，可能对中国的改革有价值。

本辑的“法和经济学”栏目有两篇文章。头一篇文章涉及的是直接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电信立法问题。最近，信息产业部向各大电信运营商、相关政府部门和专家提出了电信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程序结束后，信息产业部会对该稿进行修改，以期于2004年6月底前形成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的草案。作者周汉华教授作为信息产业部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等多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些年来一直参与其中，对中国电信业发展的问题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其中很重要的是因为电信法的缺失。因此，通过电信法的制定，明确促进竞争的基本原则，是实现电信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条件。作者以“十项建议”的方式提出了对“电信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看法，核心是“促进竞争的基本原则，不但要求在立法目的部分明确地加以规定，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中加以体现。”“不论是市场准入制度，还是独立的监管制度建设，或者是电信资源管理抑或是其他的制度设计，都必须贯彻促进竞争这一基本原则，通过竞争促进电信业的发展。”

另一篇《融资合约：法律差异和学习的影响》是以风险资本合约为分析对象的有关融资合约设计的文章。三位作者斯蒂芬·卡普兰、佩尔·施特龙贝格和费雷德里克·马特尔，来自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和瑞银华宝全球资产管理部。作者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在投资和融资合约的设计能力潜在地取决于各种制度环境因素，如公司和合同法的特征、执法质量、会计制度、税收征管、金融市场等的情况下，与融资合约理论所预测的最优合约非常一致的美国式融资合约在其他制度环境中是否也是最优的。为此，作者对美国风险资本合约和其他23个国家的风险资本合约进行了比较。他们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风险资本合约随法律制度不同而变化。特别地，美式合约在普通法国家更为流行。但是，制度障碍很少能够制约美式合约条款的实施。”他们发现，“更有经验的风险资本

能够避开法律体系的差异来实施美式合约。”作者还预言，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风险资本合约将更趋向于美式合约。

在全球化的商业大潮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各种媒体的信息包围之中，这个传媒时代对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巨大。随着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的深入，最近，媒体的产业化和对外开放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焦点话题，以往被当做“喉舌”和“工具”的事业单位，开始要走向企业化。但是，媒体产业又与一般的产品不一样，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的媒体，被看做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健康的媒体对于约束政府、增进社会福利、解决市场失灵具有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关注到媒体角色、政府监管、媒体产权以及新闻自由等等各自的以及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并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过一些探讨和研究。我们通过一组文章介绍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到媒体对政府和社会、经济的监督作用，强调了媒体在信息透明和公众知情权方面的重要作用：迪克与津加莱斯的《媒体对公司治理的作用》以及贝斯莱和普拉特的《媒体俘获和政府的可问责性》；媒体的产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政府对媒体监管的内容，以及媒体产业自身被俘获所带来的问题：霍斯普的《媒体寻租的社会》以及詹科夫和施莱弗等人的《谁拥有媒体》。同时，我们也向读者提供了一组“专栏”，讲述媒体企业产权的私人所有和放松管制的自由化后的故事：阿努普·沙阿的《媒体联合、兼并和所有权的集中》对如今的大媒体潮有很好的描述，他的《媒体与广告》一文则描述了媒体因为商业压力是如何丧失独立性而庸俗化的。高举媒体改革大旗的伊里诺斯大学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和美国《国家》杂志记者、媒体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约翰·尼科尔斯的《发动广泛的媒体改革运动》，是如何阻止美国“媒体窃国”的现象蔓延的“宣言”。我们在中国的媒体产业改革要符合国际潮流，商业化运作要与国际接轨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需要做一些研究和比较，以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这辑“改革论坛”是胡祖六的《关于政府参/控股商业银行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的最大隐忧。”他认为，政府大规模注资对于推进中国银行改革进程非常必要，但其成效取决于政府如何对政府参/控股的银行进行管理。在注资后的重组过程中，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如何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更换为市场化的管理模式。文章选择了几个具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各政府都在商

业银行持有股份，尤以发展中国家为多，有的是控股，更多的是参股的形式，所采取的措施不一，也导致很不同的结果。作者通过多个案例对各国家或地区银行治理的经验进行了分析。也许可以对我国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供比较和借鉴。

在“新书架”栏目中，我们安排了两篇即将出版的“比较译丛”新书的相关文章。第一篇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作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R·拉詹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L·津加莱斯所写的中文版序言。作者指出，对于市场体系而言，资本主义的运行需要一个基本的规则和规制架构，这样才能使所有人都能够进入该体系并由此产生竞争性。而这一基本制度需要由政府提供。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处于一种微妙的中间位置——介于缺乏规则和太多限制性规则之间。这样一个中间位置如此狭小，因此，最佳形式的资本主义非常不稳固。它很容易蜕变为一种既得利益者所有、所治和所享的体制。作者谈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有若干需要清醒认识的方面，比如，中国经济现在包含几种日益冲突的势力，前进的路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拒绝改革是不足取的。作者最后说：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看中国政府是否能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第二篇是《世纪大拍卖》一书的译校者张春霖博士的翻译手记。他感慨万千地说，“一边校订《世纪大拍卖》的译稿，一边体味着电视里和网站上的中国故事，我还是感到困惑：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有如此惊人的不同，但相同之处似乎也同样惊人。”“事实上，这本书里面的很多故事，都会让人联想起那句伟人名言：只要换一个名字，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正是这些相似之处，才最令人忧心。”《世纪大拍卖》讲述的的真实故事比学者们的模型更为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社会和政治转轨的悲壮激烈的场景。俄罗斯创造的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资本主义”、“土匪资本主义”、“瘸腿的、腐败的资本主义”。而特别值得我们思索的是该书的一段判断：“俄罗斯的转型已经不再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再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维护苏联传统制度的强硬派之间的较量，而是变成了一场争斗，这场争斗的核心也是一切革命的核心：战利品归谁？”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二辑

- 1 科学研究的目标：市场竞争还是认识世界 许成钢

政府治理

Government Governance

- 17 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 黄佩华

- 27 理解中东欧国家兴起的“运用代理机构”改革浪潮与公共治理问题

米罗斯拉芙·贝布拉维

Understanding the Waves of Agencific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Problems

They Have Raise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by Miroslav Beblavý

- 43 中国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能从美国学到些什么 托马斯·斯坦顿

Reform of Public Service: Are There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y Thomas H. Stanton

- 65 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罗伯特·卢卡斯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by Robert E. Lucas Jr.*

- 83 媒体时代 《比较》编辑室
- 87 媒体对公司治理的作用 亚历山大·迪克 路易吉·津加莱斯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by Alexander Dyck and Luigi Zingales
- 99 媒体寻租的社会 热若尔·霍斯普
The Media Rent-Seeking Society *by Gerald Hosp*
- 105 掠夺之手的镣铐：媒体俘获和政府的可问责性
蒂莫西·贝斯莱 安德烈亚·普拉特
Handcuffs for Grabbing Hand: Media Capture an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by Timothy Besley and Andrea Prat
- 116 谁拥有媒体 西蒙·詹科夫 卡拉利·麦克利什
塔蒂亚娜·涅诺瓦 安德烈·施莱弗
Who Owns the Media *by Simon Djankov, Caralee McLiesh, Tatiana Nenova and Andrei Shleifer*
- 127 专栏1 媒体联合、兼并和所有权的集中 阿努普·沙阿
- 133 专栏2 媒体与广告 阿努普·沙阿
- 138 专栏3 发动广泛的媒体改革运动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约翰·尼科尔斯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45 对电信法的十点建议 周汉华

- 162 融资合约：法律差异和学习的影响

斯蒂芬·卡普兰 费雷德里克·马特尔 佩尔·施特龙贝格

How Do Legal Differences and Learning Affect Financial Contract

by Steven Kaplan, Frederic Martel and Per Strömberg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195 关于政府参/控股商业银行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胡祖六

新书架

New Books

- 213 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拉古拉迈·拉詹 路易吉·津加莱斯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of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by Raghuram G.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 218 从邻居的不幸中学习——《世纪大拍卖》翻译手记 张春霖

科学研究的目标： 市场竞争还是认识世界

专访许成钢教授

肖梦：你的文章《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在《比较》第一辑发表以后很有影响。在我们刚刚出版的《理性的激情——16人访谈》一书中，你的自述特别谈到爱因斯坦的思想对你的影响不只限于方法论，还有他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职业等问题。其中很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关于致力于科学研究观点。你认为，深刻的学术发展最需要的不是竞争。为什么？我们如今面对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一切都在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你却告诉我们学术探讨不是在竞争中取胜！请你把你的观点说得详细一些。

许成钢：我想，爱因斯坦所说的“看灯塔的职业”有利于青年科学家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对科学有真正贡献的总是那些特别能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人。说到底，什么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搞清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认识世界，而不是追求功名利禄。中国在这么一个转轨过程中，都是希望学到最好的东西，这时候也往往容易迷信，在学术领域，简单地把顶尖杂志和一流大学作为竞争或评价的标准可能误导中国的科学研究。这时，我们希望对有心向学的人指出来。

市场在什么时机，在哪一类的问题上，产生的效果特别好；在哪一类问题上，市场产生的效果不一定特别好。其实经济学对这一问题能讨论得比较清楚。一般来说，市场本身能够产生特别好的效果，有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没有特别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二是没有市场失灵；三是第三者能确认的情况；四是市场

参与者都有无限的认知能力。所以，凡是碰到的问题符合以上条件，在市场上解决，总是效果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讨论到学术、艺术、思想等这些问题，往往严重违反上面所说的这些条件。比如学术，尤其是最有创造性的那些贡献，一定意味着在它刚出来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有判断，大多数人即便是所谓的专家也没有能力去判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不能很好地运作。

市场特别重要的运作方式是排序和评比竞赛的机制，通过评比和竞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给工作最有成效的人最高的奖赏和回报。但这往往与最需要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有冲突的。因为可评比的、可排序的、可竞争的内容通常是相似的，非常不相似的东西之间很难竞争，很难排序。但是“创造性”基本含义就是要多样化，要有不同。最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其基本性质就意味着跟别人不相似，如果把科学研究都压缩到相似的领域，或者类似的领域来竞争的话，会引导许多人做相似的工作，做低水平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和人家比。

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对自由有压制的社会里，什么是自由无需解释。专制压制自由，当然会扼杀创造。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什么是自由，人们就不是认识得很清楚。在竞争特别激烈的情况下，竞争可以变成限制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因为把研究的目标订在竞争取胜上，就意味着你不是以探索的兴趣决定你要研究的问题，而是要做别人都在做的事，努力在别人都做的事上做得比他人好。既然竞争的一个条件是能竞争的东西一定是相似的，创造性是很难竞争的，因此，当一个机制特别依赖竞争，就一定特别引导人们去做相似的、趋同的东西。所谓的顶尖杂志、顶尖大学等等的排序就意味着竞争。研究领域划分过细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领域分得细人和人之间才能评比，论文之间才能竞争。宽了以后怎么比啊？跨了学科你不就不能跟别人比了吗？不好比了，你就不参加竞争了，只有参加竞争才可能得第一，不参加竞争就一定输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当竞争机制在研究领域里变得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它会很伤害创造性。在创造性工作无所谓的社会里，竞争可能会增加效益，会让大家工作努力，但这个社会的学术会下降，长远的发展会受影响，会变得特别单调，没有色彩。

肖梦：对于国内青年学子来说，是否更重要的是要认真地做基本训练？能够在一流大学毕业，在一流杂志发表文章，这毕竟是能让别人承认的一种参考标准。难道你们不是如此吗？

许成钢：单纯以杂志的排名和学校的排名为竞争目标或工作目标，这正是我所说的迷信和误导。学生入学一定要上排名靠前的学校，文章一定要发表在排名第几的杂志上，用这个来证明研究水平和学问高低，都是把研究性工作、创造性工作和知识性的工作庸俗化。这种庸俗化实际上是极其有害的。害处之一一是它的反映不真实。历史上的例子太多了。就讲最近的例子，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弗农·史密斯，他的研究从未在所谓第一流大学，而一直是在亚利桑那大学，退休以后到了华盛顿附近的学校。为什么所谓第一流大学看不出他这么重要的、可能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呢？没有人能看出来啊，对不对？因为它与当时的主流不同！另一个例子是道格拉斯·诺思，他所任教的学校也不是所谓的顶尖大学啊！怎么能用学校的排名来说明人的真实水平和能力呢！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当年爱因斯坦毕业的那个学校也不是最了不起的学校，他做出“狭义相对论”及“量子论”等重大贡献的“奇迹之年”，根本不在大学里，而是在专利局里当小雇员的时候。爱因斯坦离开专利局以后在几个并非“顶尖”的大学教过书，然后才被普朗克看中挖到柏林去了。因为他有了成就普朗克才把他挖过去的，不是因为他的学校好他才有了成就。正好倒过来的。普朗克是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在物理学上影响特别巨大。量子力学是玻尔为中心的哥本哈根学派的贡献，那个学术机构原本也并不特别重要，最后变得重要是因为他们有这么了不起的革命性想法。最杰出的研究贡献与研究者在是否在第一流的机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紧密的。经常是因为某个杰出的学术领袖使得追随者聚集，使其机构变得重要。另一个例子是卢卡斯，卢卡斯革命的起源在卡内基-梅隆，并不是最顶尖的学校。后来是芝加哥看出了这个凯恩斯以来宏观经济学的“卢卡斯革命”，把他延揽门下。如果再说清楚一点，顶尖大学是可以培养和训练出好的做积累性工作的人，这的确有影响，你可以从周遭的人那里学习，并再做一些积累改进。但是重大的革命性的想法，并不一定从这里出来。

所以，学校的排名次并不能简单说明其中某个人的水平，杂志排名也不能说明其中某些论文的研究水平。

历史上不同领域里有许多例子。就拿经济学做例子。阿克洛夫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是被最好的经济学杂志拒绝了好几次，我的印象里是他第四次投稿才被接受的。阿克洛夫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拿到“终身”教授的人，由于他的这篇论文反复被拒绝，严重打击了他的信心，几乎要放弃这个研究方向了。这些所谓的最顶尖的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根本没有能力判断这项研究工作的价值。因此，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许多在顶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是第一流的。还有一个例子是罗伯特·卢卡斯，他得诺贝尔奖的最主要的工作，也不是发表在最顶尖杂志上的，而是发表在《经济理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ies*)上的。我们还可以举比这个更让人感到震动的例子，比如说，科斯没有一篇论文是发在顶尖杂志上的，要是按照如今通常学校的评终身教授的标准，科斯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好学校得到“终身”教授位置。再往极端来说，他甚至不可能在一个好的学校得到一个教书的位置。另一个和他有点相似的就是诺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也没有一篇文章发表在顶尖杂志上。科斯的文章贡献特别巨大，但是他的影响却是经过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的。他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杂志上，从来也不是最有名的杂志。如果用简单的杂志的等级来判断的话，就会发现有这么重要的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重要文章，当初是不能发表在顶尖杂志上的。这本身说明了评审人没有能力及时地识别出一流的研究工作。之所以他们不能识别，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因为这些是创新，这些创新与人们已经认识的东西不一样，同人们已经习惯的不一样，所以没办法评估。

其实我们离开经济学看其他的领域，情况是一样的，甚至包括艺术。美术领域评比的重要机制是定期办画展，在巴黎，只有被评选进某些画展才被认为是最好的画家，否则就不可能被承认。科尔奈跟我讲过一个很著名的事件，由于画展评选制度挑选很严，许多作品被淘汰了，因此有人办了一个被淘汰作品的画展，其结果那次被淘汰作品的画展远为更成功，远为更有影响。道理很简单，由于评审者很保守，只有平庸的作品才能入选，结果具有新想法的、前卫的被淘汰作品的画展必然超过思想平庸者的画展。

当年爱因斯坦的文章都没有发表在同行审稿制的“顶尖杂志”上。但他的工作的影响是那么巨大，是他改变了人们对整个物理世界的看法，至今人们还在追随着这个，至今那些最顶尖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追随他做更详细细致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到了美国以后的故事，1936年夏天他提交给《物理学评论》一篇论文，按制度他的论文要接受匿名评审，评审人要求他大幅度修改他的论文，他很生气，他说评审人根本没有看懂，为什么我要按看不懂的人的意见修改我的论文呢？然后他就写信给编辑说，你或者就按原样接受我的论文，或者我撤出我的论文，我不改。因为是他，编辑就发表了，否则一般人就不可以发表了。评审人制度要求你改，你就得改，其实许多评审人可以是很低水平的人，可能说的话可以是很荒唐的，但是在这种制度下作者必须尊重他

的意见。科尔奈本人也有一例，两三年以前，他的一篇论文提交给《欧洲经济评论》杂志，评审人要他大幅度修改，他给编辑写了一封信：你或者听他的，或者听我的。你要听他的，我就不发在你的杂志上，我为什么要同意他的意见呢？我不会改，因为原则是文责自负，他又不负责任，我是要负责任的，那为什么要按他的意见改呢？

肖梦：爱因斯坦和科尔奈都是大名人了，他们可以对一流杂志的编辑这样说话，但对那些还没有出名的人来说，不就意味着不委曲求全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吗？

许成钢：的确如此。在西方学术界，在没有成名之前，拒绝评审根本不能生存。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你想不想这样做，有没有胆量这样做，而是能不能生存。你这样做了就意味着你一篇文章也发不出来。在我看来，这是当前学术界所面对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之所以现在的学术界和过去的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差别，所谓过去，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那时候学术中心基本不在美国，而在欧洲，大多数学术杂志也没有这种性质的评审制度。之所以后来变成这样子，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规模培养博士造成的。大规模培养博士以后，使得从事职业研究的人数突然大幅度上升，如果杂志没有相应增加重大比例的话，每一个杂志突然面对投稿量增加太多，因此，如何保证稿件质量的问题就变成一件大事了。为保证稿件质量寻找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评审制度。这就像考试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受高等教育相关。现在不但受高等教育，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念高等学位，这么多的人要去念PhD，导致了需要考试。比如，在没有美国大规模培养博士之前，英国的制度并没有这么多人要念博士，而是已经从事了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后，有了成绩了，再去拿一个博士学位。只有那些认为自己可能会有成就的人才去从事职业研究行业，否则他不从事这个行业。这样，他可以有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自我选择的结果是只有比较少的人，事先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才去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现在的制度和过去相比顺序倒过来了，如果拿不到博士学位就不可以从事研究工作，不可以教学。因此，特别多的人在研究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选择了要做研究的职业生涯，其实他是否适合并不清楚。但是受了大量训练以后，就变成好像所有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写论文，写出来的论文质量当然参差不齐，挑选自然就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于是评审制度就变成一个重要制度

了。实际上，大规模培养博士和杂志的评审制度两者是相联系的，是造成评审制度的条件。

使用了这种评审制度之后，会反馈回来影响科学研究的质量，它对科学研究最关键的影响就是特别鼓励那种在大量积累基础上改进性质的工作，不鼓励特别创新的工作。如果我们把20世纪50年代及以前的科学和50年代以后的科学放在一起做比较，我们就能看见，20世纪前半叶科学的重大突破远超过195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如此。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虽然我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也没有系统的证据。物理学就不用说了，50年代以后没有一件性质上可以与此前相提并论的突破。比如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早期的。生物科学最重大突破就是双螺旋结构，也是在50年代及以前。人们都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有突飞猛进的重大发展，是的，但是什么性质的呢？基本是改进性质的，大量的积累前提下的大量的改进。认清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就是整个学术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研究的制度也随之变成美国为中心。原本科学研究的中心在欧洲，欧洲有自己的传统，比如德国有自己的传统，英国有自己的传统，它都有历史上积累的几百年形成的传统，传统起很重要的作用。德国在它过去的制度下产生了那么多哲学、艺术、科学各个方面的杰出学者，现在怎么几乎全没有了？所以，我有一个很重要和很有意思的问题，当年爱因斯坦的时代，那个制度下，产生的伟大科学家不是他一个人。如果人们去洪堡大学看，那么小的学校，四五十个得诺贝尔奖的人同时在那里工作，满墙挂的都是得诺贝尔奖的人的相片。当然，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间也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只有少数是重大的开创性的。而在当年在洪堡的这些获奖者中许多是贡献巨大的。我关心这制度是怎么回事。从表面上看，当时德国的科研制度与现在相似，那种制度与美国是非常不一样的，每一个教授都有很大的权力，都掌握着很大的资源。当年这个制度的好处现在可能变成了坏处：当年因为每一个教授都很强，他一定要找强的人到他的团队中去，于是就导致了其制度变得很强；现在由于教授的权力很大，他自己水平却很差，所以专门找水平比他还差的人在他的实验室工作。是二次大战使得大量优秀人才出走或遭受毁灭，德国把它已有的传统打破了，一旦传统被打破就很难恢复了。英国的学术制度也是如此，英国当然不是因为二次大战，实际上是面对美国的竞争造成的。美国学术机构提供的钱太多了，于是有能力的人都离开了。